

程千里烈士小传

程为丰

程千里烈士(1895-1927),名之驹,字藻芳,号云庵,又号千里,别号昂然,自称“昂然千里之驹”。今潜山市五庙乡红光村河湾人,五庙党小组创建人。

有为青年

烈士兄弟二人,其在家排行老二。少时命运多舛,父亲年仅29岁(1902)就去世了,从小只得母子三人相依为命,好景不长。母亲因误食野蘑菇撒手人寰,家道随之中落。尽管祖业较殷实,无奈大多是田产,加之那是一个动乱年代,赋税繁多,能收之租所剩无几,只是温饱无虞而已。兄弟二人读完私塾后,哥哥藻芬16岁就变卖田产,在家族的帮助下到怀宁石牌镇开竹木行,出外谋生。为不让弟弟辍学,哥哥支持烈士考取了安徽省立第一中学。时学校坐落于省会安庆,为长江五虎之一,得一时风气之先,烈士学习了新知识,接受了新文化,开阔了眼界。1919年为“经世致用”,烈士考上了上海测绘学校,此时的大上海新思潮、新风尚风起云涌、斑驳陆离。烈士眼界大开,如饥似渴,再一次接受新知识、新文化、新思想的洗礼。应该说在此他知晓了无产阶级的力量,看到了中国未来的曙光,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他积极投身学校的进步运动,在参加上海市工会、学生申援北京五四运动的行动中,冒着危险,走上街头散发传单。

1921年秋,烈士知家中已无力供其上学,未等毕业就走向了社会,由于其文字功底扎实,有段时间还曾从事《大公报》记者工作,频频往来于潜山、安庆、大冶、武汉等城市之间,一则是谋生,减轻家庭压力,二则是熟悉社会现状、了解底层群众的所需所盼,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识。

当时湖北的工人运动轰轰烈烈,滨江城市大冶的煤、铁资源丰富,厂矿产业工人较多,烈士认为自己所学专业非常适合在此发挥,1922年,他来到了富源煤矿,一边工作,一边参加厂内工人学习小组学习,在此有幸结识了著名工运领袖林育英,在他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密建党组

大概是1924年前后,烈士之兄考虑到弟弟已到婚配年龄,加之外面局势较乱,遂催促烈士回家过日子,烈士只得顺从,回乡在达材学校任教。

达材学校是由程氏家族知名士绅于1913年共同捐资兴建的新式学校。时为省参议员的叔父程禹卿是最大校董。该校开设课程有古汉语、英文、修身、历史、地理、自然、音乐、体育、图画等,校具齐全,还备有军乐器(时称洋鼓教



五庙党小组旧址 作者供图

学),学生服装式样统一,是潜山西乡颇为知名的高级完小。程之凤、胡绍瑗、王长青、储全章等相继在此读过书,烈士在此教书时,余良鳌、王长青亦是该校教员。

烈士在达材学校教书时间较短,但给学生的印象很深。据其学生方诚回忆:烈士敦厚老实,与人无争,分配教师宿舍,旁人争大而亮,他的房间是小而黑;待人有所求必应,喜欢同农夫、樵夫谈话;平时沉默寡言,但在必要时能仗义执言。他当语文老师,提倡白话文。教语文课时,能顺着学生的思路,随意调整几个字,就能把不通顺文字变成通顺,不合时势的恰合时势,学生都很满意。烈士经常戴顶工人帽,这在当时很少见。他身材中等,稍显肥胖,时刻不离眼镜。早晚休息时间,常在学校宽阔的走廊上踱来踱去,似有所思。他又喜欢躺在床上看书,不看旧小说,喜欢看新文学及一些不知名小册子。他对人和蔼可亲,对学生总是循循善诱,学生们都很接近他。烈士性情近乎孤僻,节假日不大回家,家庭观念较薄弱,也不喜欢接近女人,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之感慨。因而学校师生、家中上下、亲朋好友都觉得他不同于一般人,好像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殊不知,烈士正是利用教书作掩护,通过堂弟程之凤联络胡绍瑗(时胡在天柱中学任教员)、梅竹松,组织他们与余良鳌、王长青经常在一起交流理想,讨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畅谈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学生说的“不知名的小册子”,实际是指《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新锐刊物。1925年夏的某一天,这群热血青年通过走亲戚、同学会的方式来到了河湾烈士家中集中,完成了入党仪式,成立了五庙党小组,点燃了皖西南革命星火。

在当时军阀混战、白色恐怖严重笼罩之际,烈士为什么会发展他们为中共党员并建立党组织呢?除了志同道合、信仰追求一致之外,有两个方面因素不可忽视。一、他们之间有的是亲戚关系,烈士与程

之凤是堂兄弟,余良鳌是烈士的姨表兄,胡绍瑗是烈士的姑表弟。二、校友关系,程之凤与王长青都毕业于安徽法政专科学校,梅竹松毕业于警官学校,专业相近,共同语言多。之所以在烈士家里开展活动,主要是利用“灯下黑”效应,因为当时河湾有几个“大佬”均在省府安庆当官。

客观地说,党小组成员均出身于书香门第,上过大学,有学问、有见识,家境多殷实,家族有背景,谋个一官半职应是没问题,本应衣食无忧,有着大好前程。但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宁可冒着杀头风险而为之奋斗,其壮举今天仍然令我们后人敬仰不已。

喋血大冶

1925年下半年,烈士离家到广东海陆丰工作。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随军北上。烈士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少校指导员,负责编辑及宣传工作。时第六军军长是程潜,林伯渠任中共党代表。到了武汉,烈士在湖北总工会工作了一段时间,其间,参加了由董必武创办的党务干部学校轮训班学习(此班共办2期)。在这里,烈士与董必武、徐向前等有接触。

北伐结束后,烈士曾回家短住了几天。其侄女在世时曾描述了此时烈士的形象:五官端正,中等身材,头带着军官帽,腰间别着短枪,话不多,喜欢凝视远方。有一天,他匆匆提着行李箱出门了,路费还是向之凤的哥哥借的。后来才知道是湖北总工会教育局委任他担任富源煤矿工业学校第七分校主任,主要是负责筹办工人学校开展政治文化教育,启发工人如何当家做主,同资本家进行斗争。时大冶工人运动如火如荼,革命斗争士气正旺。宁汉合流后的1927年五六月间,夏斗寅叛军数次进犯湖北大冶。6月8日,叛军侵入石灰窑,向大冶地委和总工会所在地——大冶钢铁厂发起猛攻。叛军装备精良,工农武装寡不敌众,关键时刻,烈士奉命率

300余名富源煤矿学员手持棍棒前去增援。不料身负重伤,在学员背他到工校附近草丛中隐蔽时被叛军搜捕杀害。6月16日,湖北总工会教育局于武汉为惨遭杀害的程之驹等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时汉口《民国日报》《楚光日报》(董必武创办)均做了报道。

青山忠魂

烈士牺牲后,大冶的一位同事化妆成炊事员跑到石碑给烈士之兄报信,其兄即随之到大冶石灰窑,时袁家湖一带仍被叛军封锁,无法进去,只得返回。一个多月以后再回去时,因天气炎热,牺牲之人甚多,“至则其冢累累莫辨,询之土人亦莫之所”,只得“痛哭而返”,回来时仅带回了一张《楚光日报》。后来只得在河湾老屋外一个山坡上修建了烈士衣冠冢立碑纪念。

顺便说一下,带回的这张报纸作用还真挺大。1947年皖西地委专署成立后,即着手推行土地改革,一些激进的农会会员认为河湾大屋是地主浮财,应予烧毁。烈士之兄听说后将这张报纸送给刘专员看,一边还喃喃说:马克思也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的。刘专员听后感叹:“您老人家也知道马克思?真是稀奇古怪的河湾,想不到这里还有我们的革命前辈。”后即向农会会员们做宣传说服工作,河湾古民居也就完整保留下来了。这就是河湾人至今仍津津乐道的“一张报纸救了一个大屋”的故事由来。

回顾烈士短暂的一生,革命足迹多在省外,成立五庙党小组及开展相关革命活动多是秘密进行,故其亲属对烈士事迹知之不甚详细。但新中国成立前亲属在整理烈士遗物时也有所发现。如:曾看到五四运动传单,与澎湃的通信,与徐向前的合影等。当时并不知道澎湃是谁,但知徐向前原名徐象谦。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信件。还有一把参加北伐时遗留的大马刀,1940年代前期送给新四军了。烈士自编的《小学生字典》《新编三字经》等文稿当时尚存。1950年代初,烈士家的老房子曾做了几年乡村医院,特殊时期,其后代亲属也受到了冲击,致使诸多资料、遗物丢失殆尽。

程千里烈士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闪耀着光芒。他创建五庙党小组、点燃潜阳星火敢为人先的革命气魄,及舍生取义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怀念和学习。

